

目 录

自 序	1
-----------	---

· 老总背后的新闻 ·

我的新闻缘	3
复旦新闻系——新闻人生的重要起点	6
在《青年报》当总编辑的四年	9
我爱晚报	17
神交《夜光杯》	20
附：《新民晚报》老总丁法章	新华社记者 赵兰英 23

· 新视点——“我所认识的晚报” ·

继承与开拓	37
报坛楷模 风范长存	
——赵超构老社长的办报精粹	42
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所认识的晚报	50

异曲同工 曲尽其妙

——方向与方法的统一	70
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必然趋势	
——由《新民晚报》扩版想到的	75
对读者观点的敬畏	81
精品意识和一流报纸	88
扩版,扩版,成功的扩版	
——《新民晚报》的第三次扩版	93
晚报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	100

· 新思路——在总编辑岗位上 ·

在《青年报》的第一份“施政纲领”	111
办好《青年报》的切入点	130
一年来的成功改革和前瞻	133
两朵盛开的并蒂奇葩	
——上海《青年报》与《生活周刊》改革春秋	136
通讯员工作亟待强化	144
晚报功能的再认识	146
高树临清风 雨悬导向明	149
百舸争流 强者为先	152
《新民晚报》步向辉煌的奥秘	158
鼓励竞争动真格	165
转换内部机制前后	167
三管齐下 多出精品	174
咬定质量不放松	178
雪消门外千山绿	
——断有偿新闻生路	181

怎样让浦东走近读者·····	188
报业发展的重要一翼·····	192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196

· 新高度——跨越世纪的竞争 ·

关于《新民晚报》现状与未来对话录·····	203
正确处理当前工作的十大关系	
——关于《新民晚报》的发展战略·····	219
在历史的交接点上·····	236
隔洋同阅当天报·····	247
乐为游子谱新篇·····	250
为创建社会主义晚报学而努力·····	252
促进报学研究的善举·····	254
中国晚报事业的春天·····	256
创造新世纪的辉煌	
——试谈强强联合组建报业集团·····	259

· 新闻实践谈艺录 ·

评论写作的十个“为什么”·····	271
社论怎样才能写得短·····	304
短社论也可以写得绚丽多姿·····	309
向韬奋学习写言论·····	314
重温新闻工作 ABC ·····	316
晚报一版刍议·····	318
精心采写社会新闻·····	327
改进会议报道之我见·····	330
也谈经济报道及其他·····	336

4 我当晚报老总

关于经济新闻的采写·····	345
努力办好报纸专刊·····	349
繁荣杂文创作·····	356
葡萄美酒“夜光杯”·····	358
林放文章应无恙·····	361
新闻评析一组(6篇)·····	364
把“三学”落到实处·····	374
高素质新闻工作者之路 ——江泽民同志有关“讲政治”论述学习札记·····	377

· 报 海 浪 花 ·

新年寄语一束·····	395
献给主人的心里话·····	395
竭诚为读者服务·····	396
喜读两副对联·····	397
在“快新近精”上下功夫·····	398
坚持高起点 开创新局面·····	400
改进新闻宣传的新对策·····	401
加重·求新·搞活·····	402
本报今逢一万期·····	403
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405
献 辞·····	407
竞查之后致读者·····	409
为记者们壮行·····	411
四海宾朋都是客·····	413
高校校报发展的春天·····	415
华东师大校报的可贵尝试·····	418

企业报要力求“切、活、新”.....	420
《信息日报》十年走出辉煌路.....	422
《消费报》改版成功的启示.....	424
齐鲁人的“公关意识”.....	427
《福州晚报》的贡献.....	429

老总背后的新闻

我的新闻缘

我干新闻这一行，如果从 1966 年大学毕业时算起，已有 32 个年头了。再过二三年，就到了我该退休的年龄，看样子，是要“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了”。联系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从涉足新闻岗位到以后面临的几次变化，说明我同新闻还真有点缘分哩！

我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偏僻的水乡，那里自然条件很差，人称“旱涝灾害似虎狼，十年必有九年荒”。由于家境贫困，父亲和哥哥只读了两三年私塾，连书信也写不好。母亲和姐姐学校门都未跨过，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直到 9 岁那年，已经是家乡解放的第二年，我才背起书包上学。1952 年，我随全家迁居上海，在一所私立小学当了三年级的插班生，总算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

兴许是穷人的孩子倍加珍惜读书机会的缘故，从小学到考入初中，到直升高中，我读书特别勤奋，从不用家长操心，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尤其是语文成绩更为突出，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有时还贴在墙上让大家阅读。这愈发增添了我的兴

趣，开始偷偷地向报刊投稿，但屡投不中，退稿信接踵而来。1955年秋天，我刚升入初中一年级，一篇记叙里弄真人真事的短文，被上海《青年报》发表了。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在师生中传阅，还拿到了一笔稿费，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我马上拿了稿费去附近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作家谈创作》的书，开始做起作家梦来了，可见当时是多么幼稚、多么单纯！

第一次成功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我在学好正课的同时，如痴如狂地阅读课外书籍，并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有计划地练笔。升入高中以后，我利用自己担任校团委副书记的有利条件，不断向青年报刊投稿，还担任了《青年报》的通讯员。可以说，正是从这时起，我的兴趣爱好开始从自发的阶段进入比较自觉的阶段，对新闻报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1年夏天，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拿到录取通知单的当晚，我彻夜未眠，浮想联翩，总算初圆了自己的记者梦。然而，此后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顺当，我面临着一次又一次重新择业的考验……

1966年夏天，正当我们迎接分配、准备在新闻岗位上大展宏图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发生了。毕业分配整整被推迟了一年。由于我在校期间担任新闻系团总支书记，又是中共预备党员，在运动中充当了“铁杆老保”，被“理所当然”地分配到外地——江西省宜春地区。然而，在大部分同学不得不改行的情况下，在留上海的七八位同学只有一位分在新闻单位的局面下，我却因祸得福，被分配在宜春地区的《赣中报》工作，尽管暂时离别了亲人，但想到从事的毕竟是钟爱的新闻专业，心中总算得到了一点安慰。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我在《赣中报》初露锋芒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江西省以学习河

南灵宝县“精兵简政”的经验为由，砍掉了所有地区一级报纸。面临离队的危险，新闻之神又一次降临于我：不但没有改行，还作为全报社“三个幸运儿”之一，被选送到《江西日报》社工作。在那儿，我写报道，搞评论，一晃就干了6年，全省80多个县跑了50多个，次年就被提拔为言论组副组长。1973年秋天，为了照顾一位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复旦新闻系女教师回南昌，同时也为了解决我夫妻分居的问题，经组织批准对调，我重返复旦新闻系当了教师。虽然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但干的还是新闻这一行，因而我乐此不疲，1979年被破格晋升为讲师，还编撰出版了两本新闻业务专著。

出乎意料的是，根据工作需要，1983年10月，组织上又调我出任上海《青年报》总编辑，1988年年初又调任《新民晚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把我推上了新闻工作的领导岗位，使我得到了更全面的锻炼，这是我连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在对组织充满感激之余，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在工作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从爱新闻到学新闻，从干新闻到教新闻、管新闻，这就是我32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你说我与新闻有没有缘分？

复旦新闻系 ——新闻人生的重要起点

1973年8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在从事了近7年新闻采编工作以后，我重新回到了曾经6年寒窗苦读的母校。从当记者到做教师，从写新闻到教新闻，虽然都是同新闻打交道，但工作的性质和接触的对象毕竟不大一样，在这个世界里，我学习从教，度过了整整10年。

说实在的，刚回到复旦新闻系的时候，面对从家门到校门的单调生活，我这个还不到32岁的青年，一时感到很不习惯，很不适应。因此，回到学校不多久，我就提出了到《解放日报》进修的要求，这样可以回到节奏很快的采编实践中去。在系领导征求我主讲什么课程时，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新闻采访和写作。因为这门课实践性强，能够经常有机会带学生到报社实习。然而，我没有能够如愿以偿。进驻新闻系的工宣队老师傅，以我在《江西日报》搞过言论工作为由，一定要我承担起“小评论”、“大批判文

章”专题讲座的任务。这样，我心不甘、情不愿地熬了三个年头，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幸好这期间我兼任过两个班的班主任，在给学生讲授上述专题的同时，还开设了一些采访与写作的课程，并且两次带学生到报社实习和搞农村调查，没有长期禁锢在高楼深院里。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高等教育的春天终于到来了。随着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随着中央领导同志对新闻评论的高度重视，创建“新闻评论”独立学科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将这一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我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由于这门课一直未独立开设过，没有教材，可以说“一穷二白”，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怎么办？只有一切从零开始。为了这门学科的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了革命导师特别是列宁和毛主席的言论名篇和有关论述；翻阅了全国解放以来散见于主要新闻业务刊物上的关于报刊评论的各种参考资料；还不惜工本地四处打听，查找了解放前以及当今国外和港台关于媒体言论的教材等等。在翻阅这些书刊的同时，我分门别类地做了上万张卡片，剪贴了几大本言论范文，还手抄了两厚本借阅的珍贵资料。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我虚心地向新老评论行家求教，并有选择地请他们来校为学生授课，然后对他们的讲课内容加以消化、整理。除此之外，我还利用寒暑假和上课的间隙，经常到《解放日报》评论部参与撰写社论、评论员文章和署名评论，并坚持练笔，不断向其他报刊投寄言论文章，以便在教学中现身说法，取得更多的发言权。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到3年的时间，在报刊评论界一些行家的关心与支持下，我不仅能够独立开设这门课程，还汇编了一本10余万字的《新闻评论教学参考资料》，并撰写了一本

6 万余字的《新闻评论讲授提纲》(初稿),使这门学科开始有了自己的教材。在试行的基础上,这本讲授提纲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不断修改完善,逐步发展成为长达 20 万字的《新闻评论学》一书,并于 1985 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解放以后第一本公开发行的新闻评论学教材,学术界誉其“反映了该学科当前的最新水平”。第一版很快售罄,此后又一版再版。

在校内主讲《新闻评论》的同时,为适应社会的需要,我还陆续赴其他高校、企业、机关讲授新闻评论、社会调查以及消息、通讯、调查报告、工作总结、情况反映的写作等近 100 场。1983 年五六月间,我还应邀赴四川大学讲学,为该校新闻系师生开设《新闻评论》课共 50 余学时,并得到他们的热情鼓励。值得一提的是,我还应上海电视台之邀,以《小评论的写作》为题,向全市新闻爱好者作过长达两小时的教学实况转播。

至于科研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编写过两本评论教材以外,我还组织复旦新闻系七五届毕业生主编过《新闻常用文体的写作》和《新闻写作》两书。前书约 15 万字,为不少报社业务刊物连载,作为通讯员的学习材料;后者 40 万字,为大学新闻系的基础教材。这两本书,在当时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这期间,我还为《新闻大学》、《记者摇篮》以及一些报刊通讯员刊物撰写过不少业务论文,发表过系列专栏文章。

由于我在教学和科研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79 年我被晋升为讲师。在复旦大学六六届文科留校生中,我是唯一被破格晋升者。正当我潜心教育事业、有志再创佳绩的时候,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发生了:1983 年 10 月,组织上决定我出任上海《青年报》总编辑。由写新闻到教新闻,进而管新闻,内中滋味如何呢?待下一篇再叙说吧!

在《青年报》当总编辑的四年

从1983年年底到1988年年初，我在《青年报》社担任总编辑。这4年，是在祖国改革开放形势下，《青年报》人努力奋斗、继承开拓的4年，是《青年报》事业有所拓展、影响不断扩大的4年，也是我进入不惑之年以后，重返新闻第一线经受锻炼和考验的4年。这4年，无论在《青年报》的发展史上，还是在我个人的成长史上，都将留下美好而难忘的一页。

走马上任

1983年10月，正当我在复旦大学从事新闻教育进入第十个年头，一切都比较顺当的时候，突然接到市委组织部的调令，要我出任《青年报》社总编辑。说实在的，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要不要接这个担子，我苦苦思索了好几天。

我想，担任此职面临的困难太多了，起码有四个不相适应：一是从新闻教育岗位转到新闻实践岗位，从搞理论为主到搞实

践为主,工作性质、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二是从10年前曾办过大报、日报,到现在办小报、周报,读者对象、报纸风格和宣传手法都不尽相同;三是自己已过了不惑之年,如今要同年轻报人和青年读者打交道,在思想、情趣和心态上都有一定的差异;四是最主要的,从原先比较习惯于当配角到现在要唱主角,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此外,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发展,眼看各地青年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形势十分逼人,《青年报》的地位和影响受到严重的挑战。

我就是在这四个“不相适应”、一个“严重挑战”的情况下接受任命的。至今想来,我还怀疑当初自己怎么会有那样大的勇气和胆量。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我同个报纸总编辑所应具备的条件都是有一定距离的。然而,使我十分欣慰的是,在《青年报》任职的4年间,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报社同仁的支持下,我在实践中求索,在继承中开拓,自感没有虚度年华,没有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

学 展 宏 图

上任伊始,通过学习前人的办报经验和回顾自己的新闻实践,深感把握办报方针,坚持宣传方向,使报纸格局尽可能处于较高水准上,这是任何一个报纸总编辑首先应该致力完成的任务。为此,就要注意不断调整和完善包括读者对象、版面设置、风格特色等在内的办报方针。在这个问题上,我和编委会全体成员孜孜以求,因势利导,随着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小的局部的调整不算,大的动作主要有三次:

一是1984年2月,我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继承开

拓 求实创新》为题,撰写了一篇1.5万字的论文。文章对《青年报》的性质与任务、主要读者对象、基本特点、改进报纸宣传的几点主要要求以及必须切实抓好的几项基础工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这可以说是我的“施政纲领”。它对统一全社同仁思想,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报纸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二是1984年8月,在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鼓舞下,为适应当前报纸工作发展的新趋势,解决《青年报》多年来学生和青工两大读者群之间“翘翘板”的矛盾,经团市委和市委宣传部批准,我和编委会成员果断决定对《青年报》实行改版,将宣传重心转向学生青年,并增出一张主要面向职业青年、寓教于生活的《生活周刊》。

三是1985年8月,根据《青年报》改版和增出《生活周刊》以后的实践,我和编委会成员还及时提出了从1986年起把《生活周刊》由四版扩为八版的要求,并拟出了两报双八版宣传格局的讨论稿。经过反复调研、征询、论证,在充分尊重各版编辑、记者业务构想的基础上,大体明确了两报各版的指导思想、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从而确定了两报双八版的宣传格局。

实践表明,我们在改革宣传上所采取的这些决策是正确的,它增加了报纸的信息量,扩大了报纸的覆盖面和宣传的辐射面,有利于两报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办出自己的特色,顺应中外报业内容专业化和读者单一化的发展趋势。截至1987年年底我离开《青年报》社时,两报的发行势头都不错,《生活周刊》发行数接近35万份,名列那几年本市新办报纸的榜首。《青年报》1987年发行数,较1986年呈上升趋势。两报在上海的发行总数,远远超过《青年报》改版时的发行数。

在着力调整好报纸格局的同时,我和编委会成员还十分注

意根据形势发展和读者实际,提出并确定不同时期的宣传主题、宣传步骤和宣传方式。作为报纸总编辑,帮助办报人员明确每个时期的报道思想,让人家知道主要应该宣传什么,不应该宣传什么,以及怎样宣传等等,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宣传的效果,决定着报纸的方向,还直接影响到办报人员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的提高。对此,我主要通过召开编委会和每周一次的部主任例会来务虚解决。在务虚会上,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议论风生,学习形势,研究政策,领会中央精神,分析实际情况,提炼报道内容,把握宣传艺术。

比如,我们始终把“坚持改革,造成有利于青年投身改革的舆论环境”作为报纸宣传的主旋律。但由于改革的发展呈现出复杂性、渐进性,不同时期人们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表现出不同状况,因而报纸宣传改革的重点、方式也应有所不同。1984年春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处在兴起阶段,我们率先在报纸上开展推荐评选优秀青年厂长、经理的活动,发表了一批锐意改革和开拓进取的青年改革者的典型,为他们的脱颖而出和健康成长鼓与呼;同时,在宣传改革中我们还较早突出了要破除旧观念、树立新观念这个主题。1985年初,在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中,有些地方和单位划不清改革和不正之风的界限,挫伤了一些青年改革者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报纸在上海最早发表《要珍惜和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的评论,旗帜鲜明地指出:不正之风,决不是改革的必然产物;只有反对不正之风,才能更好地推进改革,并发表了大量既坚持改革又反对不正之风的典型。1986年上半年,随着改革的深入,新体制和旧体制处于均势阶段,改革呈现出一种复杂、胶着的局面,不少青年对此不理解,对改革的前途产生疑虑。经过反复务虚,我们逐步认识到应该把宣传的重点放在提高青年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培养和树立与新体制